

加缪的思想世界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LBERT CAMUS

王洪琛 著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基金资助

加缪的思想世界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LBERT CAMUS

王洪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缪的思想世界 / 王洪琛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495 - 1068 - 9

I. ①加… II. ①王… III. ①加缪, A. (1913 ~ 1960) —思想评论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2899 号

出 品 人: 刘广汉

策 划: 魏 东

责任编辑: 魏 东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 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中段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18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论	主题、方法与线索 / 1
第一章	自杀,或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 11
第二章	荒诞的人:《西西弗神话》解读 / 31
第三章	反抗的诗学:《局外人》及其他 / 49
第四章	《卡利古拉》:自我的边界与自由的困境 / 68
第五章	《鼠疫》:在荒诞与反抗之间 / 86
第六章	从“加缪事件”看 20 世纪的思想纷争 / 104
第七章	论悲剧美学的现代转型 / 127
第八章	“南方思想”:加缪的希腊想象 / 145
第九章	故事、“反故事”与现代艺术 / 166
第十章	存在、记忆与见证 / 186

主要参考文献 / 201

附录一	理论主义的贫困 / 211
附录二	经典阅读与自由教育 / 221
附录三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美学 / 232

绪论 主题、方法与线索

这是一部围绕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展开的文学批评著作。在全面梳理其文学创作、哲学思辨、伦理实践以及社会活动轨迹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分析、语境还原与文本批评,对 20 世纪法国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展开了尽可能细致、深入的评论与诠释。其中既有对加缪写作脉络的清晰整理与对生活事件的着力刻画,又有围绕生命、死亡和存在等重要论题开启的富于积极意义的对话与问难。本书力图摆脱千人一面的理论主义腔调,在注重学术价值的前提下,追求一种个体化的论述风格与批判性的思想锋芒,努力穿越文学进入文化、由艺术论的路径进入思想史的视野。



本书的全部努力是要解决如下问题:加缪究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怎样的思想世界?与此相关的两个子问题:加缪的文学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1873 年,青年尼采曾经恳切地说,要把握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如果只是列举原理而埋没其人个性,“陈述就会变得如此乏味。因为,在种种被驳倒的体系中,恰好只有个性的东西能够吸引我们,那是永远不可驳倒的

东西。用三件轶事可以构画一个人的形象”^①。因此,在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时,他总是尝试从每个体系中提取三件轶事来激活沉睡的思想因子,让它们在古希腊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在探讨希腊悲剧的诞生与消亡这个大问题时,他也习惯于从分析著名悲剧家的具体作品入手,在对人物、场景、修辞及戏剧冲突的具体揣摩中把握其思想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择取具体例证而舍弃抽象体系,走进哲人的生活而远离教条的理论,这是尼采着手研究时的方法论。

不谦虚地说,当我由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介入关于加缪的论题,并尝试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解答其当代意义这一问题时,尼采的立场、观念与方法就是我这项研究的榜样。然而,几乎在切入这个论题的一刹那,我发现自己面临的第一个困惑居然是:对这个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获得过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全名叫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的人,究竟该如何定位——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抑或哲学家?^②在往昔的岁月里,他曾经先后被慷慨地冠以上述光彩夺目的称号;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位不合时宜的作家依然被为数不少的读者所景仰与拥戴。但是,在细致阅读过加缪的全部作品、深入体察其生死爱欲之后,我却分明感到,所有这些称谓尽管各有其合理之处,但单独哪一个又似乎未能概括加缪的全部特质。

或许,就此问题而言,还是应该听一听加缪对自己的评价罢:“我并非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着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

① 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3。

② 对加缪生平的复述不是本书的重点,这方面内容可参看几本重要的作家传记,如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陈良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布瓦岱弗尔:《今日法国作家》,鲍刚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Bronner, Stephen Eric, *Camus: Portrait of a Moralist*, Minnesota Press, 1999。

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①这是在《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1952)中,他对自己的写作初衷与角色意识的概括。的确,如其所说,从自己的时代出发,为自己的时代写作,这确实是他人生的出发点。青少年时代的清贫与困顿滋养了这位靠笔安身立命的人,他也终以不屈的姿态与不懈的努力在文坛赢得一席之地。虽然生前身后的声名并没有让他过上富裕阔绰的生活,但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所馈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已经传诸久远。在这个意义上,加缪与其说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不如说是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伤有痛的“个体”。实际上,在今天这个话语泛滥、思想贫乏的时代里,以文学的名义遭遇一个真实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这正是我选择加缪作为研究对象的首要理由。

以加缪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其次的目标是为了推进当下学术界的“加缪研究”。近年来,随着存在主义文学、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加缪的文学思想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也出现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1)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与阐释^②;

① 加缪:《时政评论二集》,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53。

② 这一类研究文献呈现出多样而杂乱的趋势,相当多的作品诠释颇能启人心智,但近年来也出现了重复与过度诠释的迹象。笔者不准备面面俱到地历数这些文献(也无法做到),这里只将本人在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代表性论著例举如下:(1)外文专著有:Interpreting La Peste, Journal article by Colin Davis, *The Romanic Review*, Vol. 85, 1994; Thomas Hanna, *The Thought and Art of Albert Camus*, Chicago: Gateway, 1958; Kamber, Gerald, “The Allegory of the Names in L’Etranger,”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 22, 1961。(2)汉译著作有:考夫曼辑:《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理查德·坎伯:《加缪》/《萨特》,中华书局,2002年;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华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中国学者的专著有: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存在与虚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4)相关期刊上的论文浩如烟海,仅仅在1994至20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以“加缪”为标题的论文就有141篇之多,其中多半是有关作品评论的,如钱翰:《加缪的〈堕落〉中的罪与忏悔主题》,《国外文学》2009年第4期;郑克鲁:《加缪小说创作简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周小珊:《走进加缪——读〈第一个人〉》,《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赵秀红:《加缪〈鼠疫〉中的悲剧意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等。显然,一个围绕加缪展开的多样化的诠释空间正在形成,这实际上也是加缪走向经典化的题中之义。

(2)对加缪的思想渊源、发展脉络的概括^①;(3)对存在主义美学概况的评述^②等方面。然而,相对于方兴未艾的“尼采研究”、“海德格尔研究”与“萨特研究”,当下学术界的“加缪研究”不仅显得有些单薄,而且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者多将加缪裹挟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对其思想的独特性认识不够;第二,从现代性角度系统梳理加缪的思想资源、全面分析其文学成就的著述尚不多见;第三,作为一个时刻“在场”的文学家、思想家,加缪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当代人对生活的理解,而目前的研究却常常忽略对其当代意义的正面探讨;第四,借助译介的力量,加缪曾直接影响过1980年代的中国启蒙主义思潮,但从接受美学角度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由这些无可回避的现象出发,尤其是当笔者着重突出对这些问题的观照之后,本书的研究就不再显得没有意义了。简单地说,本书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对加缪的多维度思想展开谱系学分析,从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传统与存在主义哲学等层面挖掘其思想的内在根源,梳理加缪与克尔凯郭尔、尼采和卡夫卡等人的精神盟友关系。努力把握加缪文学思想

① 这一类研究文献在欧美与中国的表现有所不同。欧美学者的梳理多向思想层面开掘,多注意它与希腊、与基督教的深层关系,如 Archambault, *Camus' Hellenic Sourc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2。当然,他们对发展脉络的把握同样富于特色,如 *Poverty in the Writings of Albert Camus*, Journal article by V. C. Letemandia, *Polity*, Vol. 29, 1997。而在这个领域,中国学者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多倾向于社会层面的解读,如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杨大春:《沉沦与拯救:克尔凯郭尔的精神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三联书店,2007年;冯俊:《当代法国伦理思想》,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这些著作作为加缪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 这一类研究文献的数量同样庞大,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但必须指出的是,哪怕是将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我们也能发现,许多思想立场差异不小的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贡献过才智,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柳鸣九、郭宏安、史忠义、杜小真、何怀宏、郑克鲁、刘小枫等知名学者,他们的译介与著述为我们更深入地走进加缪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平台乃至辩论舞台。一定程度上,上述学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46—250。

的核心,即对“荒诞的人”的描画与反思,并围绕其作品具体阐述“荒诞”、“反抗”这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辨析加缪与萨特之间由对“进步暴力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决定性分歧,尝试摘掉前者始终拒绝接受却长期以来被强加于身的“存在主义”的“帽子”。同时,从价值论角度,强调加缪对于当代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浪潮的抗拒与反驳,凸显其思想的当代意义。而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在当下语境里重新复原与展现加缪无限丰富的思想世界。

一

在我看来,加缪实际上是一位站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上的文化英雄。在现代虚无主义浪潮中,他的写作既是对价值人生的一种坚守,也是对20世纪人类精神资源的独特贡献。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其思想的核心主题。他将文学写作与意义追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而且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可以说,加缪所身体力行的作为“见证”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这同时预示着,无畏地反思个体生存之边界,勇敢地担当漫漫人生之荒诞,在诗与思的对话中体验自由的精神,或许是21世纪的中国文学走出狭隘与自闭、重新拥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契机。

思想的突围与观念的回归是这部著作的突出特点。而在具体行文中,本书体现出来的方法论特色主要有:第一,有意识地运用比较诗学的方法。将加缪的文学思想置于20世纪文学史、政治史、思想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审视加缪文学思想的来源、特质与局限,并且有限度地突出对加缪与基督教、加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与萨特之间思想关系的评述。由此,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不仅使加缪的文化意义得以明晰化,而且在他的思想参照下,也使消费时代里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得以明确化。从而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确立新的思想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审美现代性研究。

第二,落实具体的文本分析。拒绝“理论主义”的书写窠臼,强调对研

究对象感同身受式的体验,努力驾驭一种人文主义的写作风格。这里所谓的“理论主义”,并不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命名,也不是对特有艺术流派的发现,而是对当下学术研究中存在之问题的把握,其基本特征是:膜拜逻辑而非生活,依赖理论而非经验。毋庸讳言的是,这一运作模式已显出了明显的弊端——不仅制造了太多的学术泡沫,而且正在危害我们感官系统的健康。而借助对加缪一系列作品的体贴式阅读,我的潜在目的正在于,挑战这一流俗的学术路径,提供一种面向个体经验的研究个案,致力于把握新的思维范式,借以审视文学理论与生活经验的关系、文学研究与文化语境的关系,突出文学研究的实践性品格。

第三,尽最大可能吸收相关的中外文献,在消化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将厚实的文本考证与缜密的抽象思辨结合起来,力求对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定位与结论。众所周知,理性对这个世界而言意义重大。人类根深蒂固的好奇心无一不是通过对“是什么”与“为什么”的追问加以解决的,人类无可名状的理解冲动无一不是借助对“从何而来”与“到何处去”的追问得到回答的。因此,必须珍惜以追求智慧为方式、以认识世界为目标的理性。简言之,理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之一,是能够体现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最内在标志。如果漠视了理性的声音,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不仅只能在话语符号之间飘荡,而且还会失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根据。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加缪的研究不仅要从方法论上遵循理性的要求,而且在思想目标上也要强调理性的重要。最终,通过对加缪写作旨趣的考量,回归生活世界,弘扬文学写作中值得珍视的关怀生命的优良传统。

三

关于主题与方法的表达到此为止,它们会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得到更为具体的呈现。为了阅读方便,这里先叙述一下本书的基本线索:

第一章以“自杀,或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为题指出,作为一个关注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想家,加缪对于自杀问题有自己的见解。他拒绝把这

一沉重而严峻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或精神医学的关怀对象，而是毫不含糊地从哲学层面加以分析与考量，从而显出一种不为俗见所囿的理智与清醒。通过对其分析逻辑、主要观点以及思想源泉等三个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加缪关于自杀的思考是一个从荒诞出发的旅程，自由、反抗与激情是他所认为的荒诞的三个结果，而承受荒诞、拒绝自杀和反抗绝望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选择。而在加缪的思考过程中，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救赎信仰以及变幻的时代风云共同构成了其思想底色。

第二章延续前文对《西西弗神话》的深层解读，除了进一步指出这部散文经典的核心是对“荒诞感”的体验与把握，是对另一种较为真实的存在之忧思之外，还重点分析了加缪笔下的三种“荒诞的人”：唐璜、演员与西西弗。依照加缪的细致诠释，如果说“唐璜”是爱欲的象征，而“演员”的荣耀令人心碎的话，那么“西西弗”留给世界的背影却苍凉而执著。在此基础上，加缪得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从荒诞感出发的现代人，不必选择自杀这一穷途末路，亦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对于这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的结论，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接受，笔者相信，有一点是肯定会被认同的：作家所直觉到的荒诞人与现代人的本质关联，是其哲思的主要贡献。

第三章同样是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对加缪著名小说《局外人》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加缪的文学世界里，“人”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状态。比如，无论是在他所着力塑造的默尔索等人物形象身上，还是在他始终念念不忘的爱琴海上的耀眼阳光之中，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人与世界之间的顽固而恒久的陌生与疏离。这显然与他的文学观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加缪看来，文学存在的目标是为了纠正现实的“行动”。而所谓的“纠正”不仅指借助沉思生存真相来肯定、赞扬和完善生命，而且还需要一种“转回身说‘不’”的勇气与力量。换言之，加缪以诗学的方式举起的，其实是一面“反抗”的旗帜。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他的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我反抗，故我们在”为旗帜，在反思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作家的文学写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

第四章的内容如其题目所示,是以加缪的戏剧代表作《卡利古拉》为例,分析现代人的自我边界与自由困境。笔者认为,在《卡利古拉》中,加缪借助对现代启蒙的反思,讲述了一个由自我发现、自我膨胀到自我毁灭的故事,既鲜明地展示出现代自由的困境,又深入地探讨了生命的可能性、必然性与现实性问题。在这部分里,为实现作品对观的目的,笔者还具体阐释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氏借助小说主人公伊万的悲剧表明,当理性不再只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手段,而被当成全能的精神法则与尺度,甚至被当作生存目的本身时,“理性”的崇拜者可能会失去正常的理智而走向心灵的虚妄。由此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任何被理性化了的道德、历史或政治的救世方案,而执意选择能体现出自由、至爱与和谐的“上帝”。显然,这个结论与加缪的价值选择呈现出大相径庭的趣味差异。笔者以比较诗学的方式入思,在着重对比“卡利古拉”与“伊万”两位主人公的精神困境的基础上,不仅着力于揭示两部相互发明的作品的内在涵义,而且再次强调了现代人应该具有的边界意识。

第五章注重的依然是文本分析的功夫。在这里,笔者将小说《鼠疫》中的精神信念判定为在荒诞与反抗之间的抉择,认为作家生动地刻画了那个恐怖时代里人们所经历的从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以及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望。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注入作家一贯的对生命、死亡与存在的思考,不仅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了极致,而且构造了一种荒诞与反抗之间的张力,肯定了力所能及的行动的力量,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这部分的特色是力图借助对表层文本的叙事学解释与对深层意蕴的哲理性挖掘,从双重维度把握小说中细腻丰富的肌理。

第六章无论是篇幅还是论述对象都堪称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由加缪《反抗者》的发表引发的所谓“加缪事件”,是20世纪思想史上的核心事件之一。它围绕如何评价历史主义以及如何看待道德相对主义这两个问题展开,反映了萨特阵营的虚妄,折射出20世纪思想界歧异、纷争的历史事实。本章围绕这一核心事件从四个方面展开论析:第一部分介绍了“加缪事件”的缘起与结局,指出其背后所涉及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历史主义的理论困境,批判性地观照了加缪—萨特之

争的内在理路;第三部分围绕关于“共通人性”的争论展开,附带论及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姿态问题;第四部分是作为本章附件而存在的,评述了波普尔论马克思时的思想发现,目的是进一步从历史主义批判角度为20世纪的思想纷争提供一份理论旁证。

第七章论述的是悲剧美学的现代转型。在这部分里,笔者分别从加缪的戏剧创作、理论思考与悲剧意识等三个方面切入论题,具体指出,作为一个富于悲情气质的现代作家,加缪不仅在自己的戏剧创作里,而且在积极的理论思考中,都致力于建构一种现代悲剧美学。这种悲剧美学,以现代人的命运为关注重心,以人生的荒诞性为原初判断,以生命的悲剧意识为思想基点,以复兴现代悲剧为理论旗帜,称得上是对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悲剧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为现代人探究“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参照。此外,这部分还强调,加缪的思考的独特意义在于,以作家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为源,为贫乏时代的生命个体提供了一份美的见证。

第八章延续的依然是对加缪美学思想的思考。在详尽的资料爬梳基础上,笔者指出,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是加缪的梦幻之都,是他珍藏在内心深处的一方净土。在他的思想世界里,中道、平衡与节制是希腊人的精神内核,通过审美达成自由是希腊人的人生目标,热爱生活与彻悟存在是希腊人的生命状态。而所有这一切,在毕生追求两极平衡的加缪看来,恰恰是能够疗治现代人精神病痛的一剂良药,足以为弥合“荒诞的人”与无意义世界之间的沟壑提供一种可能性。在这部分的最后,笔者指出,加缪的希腊想象令人神往,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现代的“审美的人”。

第九章选择了一个有趣的角度切入: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有人说加缪不再编织故事了,而加缪本人也曾表示过小说与哲学的联姻关系。但笔者经过一系列分析认为,加缪并非是一个“反故事”的作家,他只不过使得小说有了更多的哲理意蕴。换言之,加缪依然坚持文学作品中单调的哲理诠释没有太大意义,只有故事里天然蕴涵的“感性的表象”才是最核心的因素。由此笔者认为,不能将加缪的话简单理解成“哲理”对“故事”的征服,或“哲学”对“文学”的征服,而必须深入现代小说的内在机理来看待故事的意义。

第十章是本书的尾声,带有一定的结语性质。笔者在此指出,存在、记忆与见证是加缪美学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但在具体论证中,加缪却拒绝把“存在”抽象化,拒绝将“人”工具化,甚至不急于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致力于实现人对自身“人性”的回归。在他看来,“存在”的真正使命在于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任何对人的符号化都是彻头彻尾的背叛。“道德之美”是加缪其人其作的突出特性,是20世纪极少数作家所能拥有的可贵品格。在宗教信仰被怀疑为虚妄的今天,回到审美体验,在艺术世界里感受生命的伟力,或许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学,是加缪留给世界的最真实记忆。加缪所身体力行的“见证式写作”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原或摹写,而是一个通向真理的中介,是洞察现实苦难之后的再创造。此外,它还是塑造个体的桥梁与实现自由的前提,能协助我们恢复人的尊严与伟大。做一个“自由射手”,这是加缪的力量之源,也是他最可铭记的意义。

总之,加缪从存在主义哲学与希腊悲剧精神中汲取营养,接续法国哲人作家传统,由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出发,倾全部心力于“个体生存的边界性”这一20世纪的严峻问题,显示了一个异端思想者的姿态。他的全部作品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精神源泉:荒诞之思。也就是说,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求和向往与生存有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奋斗作为与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这种被称之为“荒诞”的思想,是加缪所有作品的出发点与归宿。继承康德启蒙思想的加缪,不愿意任何人为了明天牺牲现在。他鲜明地主张,人是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一个人想成为什么,必须在人生中进行。加缪对“荒诞”展开的殊死搏斗,是要在一个虚无的世界里实现意义;或者说,他对“荒诞的人”的刻画是要通过“审美”完成对可能世界的探究。在这个意义上,加缪通过聚焦于“荒诞的人”的写作,思考了荒诞与反抗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了现代悲剧诞生的可能性,在故事的维度中尝试诗与思的统一,力图用希腊艺术精神照亮现代人的虚无之旅,从而拓展了生命的可能性,提示了由“荒诞的人”走向“审美的人”的精神路径,值得我们恒久珍视。

第一章 自杀,或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作为一个关注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思想家,对于沉重而严峻的自杀问题,加缪有自己的见解。他拒绝将其简单归结为一种社会学或精神医学的关怀对象,而是毫不含糊地从哲学层面加以分析与考量,认为这是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从而显出一种不为俗见所囿的理智与清醒。加缪关于自杀的思考是一个从荒诞出发的旅程,自由、反抗与激情是他所认为的荒诞的三个结果,而承受荒诞、拒绝自杀和反抗绝望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选择。在加缪的思考过程中,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救赎信仰以及变幻的时代风云共同构成了其思想底色。这部分内容分别从加缪的分析逻辑、主要观点以及思想源泉等角度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 加缪的分析逻辑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①在《西西弗神话》开篇,加缪抛出的这个令人诧异的判断,一直执拗地拨动着许多人敏感的神经,以至于以研究存

① 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I,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69。(本章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

在主义著称的美国教授考夫曼(Walter Kaufmann, 1907—1984)据此将加缪等人判定为“半个苏格拉底”,认为他们并非“在处理一些既无聊又愚钝的事情”,而是“热切地关心那些发源于日常生活、诉诸道德痛苦且必须由哲学严正担当的人生信念问题”。^①而对于当代著名学者刘小枫来说,尽管自己的思想立场与加缪有着根本性差异,却依然在《诗人自杀的意义》这篇长文中高度肯定了后者所提出的问题的深度,并且进一步指出:“如果这一论断就某一类型的哲学来说正当而且真实,诗人自杀就应该是这个严峻的哲学问题中最为严峻的部分。”^②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加缪的判断不仅切中了时代的脉搏,而且触及哲学的原初形态,即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反思与选择。

让我们首先来把握一下作家的分析逻辑。在我看来,加缪分析逻辑的第一个特点是,他是在拒绝了两种重要的自杀学研究范式之后切入论题的。众所周知,19世纪以来,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先后成为研究自杀现象的重要理论武器。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是社会学领域的代表,其《自杀论》(1897)亦已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献。在这部书里,他首先为“自杀”下了一个冗长的定义:“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作自杀。”^③然后,在细致分析了来自不同角度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他将所有的自杀统一依照“社会标准”分成了三种类型——利己型自杀(源于社会整合的缺乏)、利他型自杀(源于社会整合的过度)与失范型自杀(源于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的社会危机)。总之,在迪尔凯姆看来,自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跟种族因素、遗传因素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等并没有重大关系,反而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工作变迁等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承认,由迪尔凯姆开创的这种自杀学

① Walter Kaufmann,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Inc., 1956, p. 51.

②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页39。

③ 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社会学研究》,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页9—10。

研究范式一度成为现代自杀学研究的主流,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指出的,虽然不少学者试图颠覆迪氏的解释模式,但都“基本上没能在迪尔凯姆的理论上添加什么重要的东西”。^①

然而,加缪偏偏是在断然拒绝社会因素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的。他说,“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则相反,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类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幽处酝酿的”,“开始思考,等于开始被耗。社会对此是无大干系的。耗虫长在人心。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页70)。换言之,加缪不乐意把人只当成社会的动物来看,不赞成仅仅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对待让人心痛的自杀问题,而特别强调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内在心理的挖掘与勘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接受了勃兴于19、20世纪之交、在加缪的有生之年依然声名显赫的精神分析理论呢?的确,在自杀问题上,相对于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拒绝,加缪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似乎有些含混。这不仅在于后者所坚持的精神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对加缪思想的形成颇有助益,而且在于他恰恰在20世纪的历史上体察到人类太多的与“生的本能”相对应的“死的本能”。

正如我们所熟悉的,“死的本能”是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在《超越唯乐原则》(1920)中正式提出,并在其后期理论转向中起过核心作用的重要范畴。它与“生的本能”一起,标志着弗氏的思想关切由神经精神病学的狭隘范围走向了对人类文明的整体透视。弗洛伊德发现,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除了寻求快乐与满足的唯乐原则之外,还有一种强迫重复原则,它要求重复事物的初始状态,体现出足够坚韧的保守性与破坏性,因此可被命名为“死的本能”。两种本能相反相成,相依相靠,共同促成了人的生命历程中动荡不安的独有节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无奈地认为,死亡与其说是一件值得伤怀的惨事,“毋宁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适应生命的外部条件的一种表现”。^②

① Anthony Giddens, “Theories of Suicide”, in *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London: Cass., 1971.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唯乐原则》,林尘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页51。